宋史刑法志考正

鄧廣銘

自　序

宋史中的志凡十五種，共爲一百六十二卷，差不多佔宋史全書總量的三分之一。在整部二十四史當中，不但志的卷數全都沒有這樣多，在一書中志的比例數達到這樣高的，也再沒有第二種了。

在宋史的十五種志當中，刑法志共只三卷，是卷數最少的一種，然而在這三卷書中，其有待於我們考索訂補的問題，卻不是各志中爲數最少的一種。

一　宋史刑法志的來源

我對宋史刑法志的淵源力爲探索的結果，在今天，還只能得出以下的三項答案：

第一，宋史刑法志不是直接以宋代國史中的志作藍本，稍加删改而成的。

第二，宋史刑法志當中的一部份記事，是從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中的刑考抄襲來的。

第三，宋史刑法志的記事，除抄用文獻通考外，還從別的書中採摭了一些。所以它的來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以下，我對這三項答案稍加論證。

在宋史諸志的小序當中，有好幾種都曾說到它自身的淵源。例如天文志的序末說：『今因先後史氏所紀休咎之徵，彙而輯之，作五行志。』禮志的序末說：『今因前史之舊，芟其繁亂，彙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輿服志的序末說：『今取舊史所載，著於篇，作輿服志。』選舉志的序末說：『今輯舊史所錄，

……櫽括歸類，作選舉志。』既有這樣的聲明，知其取材必不外乎宋國史的各本志。

在元代設置史局纂修宋史的時候，宋代國史中的上述各志既還都完整可作依據，其中的刑法志斷不會單獨殘缺散失；如不曾殘缺散失，則修撰宋史刑法志的人斷不應不加參考採用的。然而事實卻是非常奇怪，不但在宋史刑法志的小序中沒有說到導源於國史舊志的話，我們把現尚散見於史册中的宋代國史刑法志的片段文字與宋史本志對比，見其間異同甚大，也適足證明二者間確實沒有直接的源流關係。

李燾的續通鑑長編卷三四四，神宗元豐七年三月乙巳，記『詳定重修編敕所』修元豐編敕成；删定官崔台符、王震等遷官賜銀絹事，其下附載夾注一段說：

> 刑法志云：初議修敕必先置局，詔中外言法之不便與約束之未盡者，議集然後更定。所言可采而行者，賞錄其人。書成，詔中書樞密院及刑法司律官俾參訂可否以聞。
>
> 始咸平敕成，別爲儀制令一卷，天聖中取咸平儀制令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慶曆嘉祐皆因之。熙寧敕雖更定爲多，然其體制莫辨。至元豐修敕，詳定官請對，上問敕令格式體制如何，對曰：『以重輕分之。』上曰：『非也。禁於已然之謂敕，禁於未然之爲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之謂格，設於此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知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敕令格式則典則也。若其書備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這一段文字，必即是李燾所依據的北宋國史刑法志中的一段。宋史刑法志第一卷中也載神宗和臣僚談論敕令格式的這件事，但文字與此段大不相同，對於敕和令所下的界說，也正和此段互相顛倒。今查宋史本志中的一段，和洪邁容齋隨筆的「敕令格式」條文字完全相同，我們姑不論其爲直接或間接抄自洪氏之書，其與國史刑法志之絕無因緣，卻是可以斷言的。

續通鑑長編於同一年月日又載有更定治盜重法事，首謂『自嘉祐六年始命開封

府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寧中諸郡或請行者，朝廷從之，因著爲令。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以下便詳載「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等條文，卽上文所說元豐中更定的治盜重法。條文後有附注說：

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時。因編敕成，附見。須細考之。

宋史刑法志也載「治盜重法」先後的幾次演變，行文和長編不相同，而在「凡劫盜罪」云云句上，首冠「熙寧四年」四字。李燾在國史舊志中「不得其時」，而宋史本志則標舉了的實年份，這使我們又可斷言：宋史刑法志的這一段，一定不是刪改國史舊志的文字而成，而必是從另外的史書中採輯來的。然據長編所說，知道「凡劫盜罪當死者，……妻子編置千里」等條文，乃是「元豐更定」的新辦法。宋會要刑法門也載有一事云：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監院御史趙卨言：『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者，妻子編管。元祐新敕一切削去，前此編管者宜不少，請令從便。』從之。（刑法四之三〇及六之二〇凡兩見。）

這是一條極有力的佐證，可以證明編管盜賊妻子的辦法，確實是在元豐中才立定的。今查史志此段與文獻通考刑考六記載定立治盜重法事的文字全同，通考也正是繫其事於熙寧四年的。兩書對於這件事情爲什麼繫錯了年份，我們雖然不能考知其故，但此項錯誤之首出於通考，宋史本志此段記事必是全自通考照抄而來，卻又是一樁極明顯的事。

就以上兩例推考，自然可以知道：假如在元代修撰宋史之日，負責刑法志的史官曾有宋代國史的刑法志作藍本，他們斷不會棄置上引兩段於不顧，而卻這樣東鱗西爪地去拼湊綴緝的。他們既不曾用舊史刑法志作底本，則宋史刑法志的全部紀事，不唯與舊史志文相異者是從他書採掇而來，卽其與舊史志文偶同的，也一定不是直接導源於舊史，而是展轉從他書中輯錄來的。

以上是對於第一項答案所提供的論據。至於修宋史刑法志的人們究竟何以棄置舊史本志不用，我對這一問題還是無法加以解說的。

文獻通考之作成，下距宋史之纂修，尙有二十幾年。書成之後，先經王壽衍於

元仁宗延祐六年（一三一九）謄寫進呈，到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二二）降詔「校勘刊印」，到順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方設局纂修宋、遼、金三史。大約在文獻通考刻成之後，立卽列置史局，備修史諸人的參考。因爲其中所載多爲歷代的朝章政典，且多半直到南宋爲止，對於負責修撰宋史諸志的人遂特別重要。故如宋史職官志，其中不但大量地抄襲了通考職官考的記事文字，連其中所載入的諸家以及馬端臨本人的議論，也襲用了很多。宋史刑法志抄襲通考的情形，大致與職官志是相同的。今且摘錄其中抄襲跡狀最顯而易見者數事爲例。

一、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有安定婦人殺害了其夫前妻的兒媳，朝廷爲此事曾特別降詔立法，原詔見宋大詔令集卷二百刑法類上，其末尾幾句是：

今後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其婦，並以殺傷凡人論。

長編所錄節文與此全同。通考刑考九引此數句，改作：

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

一字之差，原意大改。而宋史刑法志所載此詔節文，卻完全和通考相同。

二、通考刑考六記仁宗天聖五年陝西旱災事，其下卻附載司馬光論除淮南京西盜賊事宜的一道奏劄。今查天聖五年司馬光還只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而那道奏劄卻是英宗治平元年所上，先後相差幾四十年。這樣明顯的錯誤，史官們竟也漫不加察，宋史刑法志中竟是一字不易地照抄了通考這段記事和司馬光那道奏章。

三、仁宗景祐二年，侍御史龐籍上疏，請求郊祀後不要大赦，通考刑考十二赦宥門把龐籍的奏疏節錄了一段，卻只說「言者以爲」云云，而不著龐籍姓名。於龐疏節文之後，通考中附加一段文字，說明此疏未被採行之故。宋史刑法志的末卷之末，也有龐籍此項奏章的節文，也只說「言者以爲」云云，其下也附說未被採行之故，而整段文字也和通考完全雷同。

四、葉夢得的石林燕語卷二，有一條記蘇頌於元豐中建議「請依古置圜土」以處流罪人事，通考刑考七將此條引入而誤脫「置」字，史志卷三也引入了，而也一樣的漏去了「置」字。

五、通考刑考六於熙寧八年李逢、王廷筠、趙世居、李士寧諸人獄事下，附載一段按語云：

按：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經用，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謂，故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這段按語是較記事正文低兩格的，故必是馬端臨本人的議論，而在宋史刑法志卷二，於同一獄事之下也同樣有一段議論說：

若凌遲腰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於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流毒不已。

兩相比較，史志中的斧鑿之痕猶自可見。然則我們斷言史志中的一部份記事是從通考抄襲來的，當不會有絲毫誣枉之處了。

宋史刑法志中的記事，凡其不是照抄或改削文獻通考中的文字的，大部份也可以在現尚傳世的兩宋官私史書中找得一些線索出來。可惜線索只是線索，其因襲的跡狀全不像因襲通考那樣的明白易見，所以我們不能再確指某一種書是修志者確曾從其中採輯了某條記事的「源頭書」。然而像專記南宋史事的幾部書，如熊克的中興小曆，留正的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以及書坊編刻的宋史全文等等，其中或多或少，總都有一些和宋史刑法志似有源流關係的條目。這些條目卽令不是直接從上舉各書中引錄而來，也必是展轉從另外的一些什麼書上零星稗販來的。這樣自然便又歸結到我的第三項答案：宋史刑法志中的記載，是從許多種書冊中漁獵而來，既不是單從文獻通考的刑考各卷中的條目摘抄而成，也不是單就另外的某「一」種尚未被我們發見的刑法史志之類刪削潤色而成的。

二　宋史刑法志的疵病及本文的作意

歸納宋史刑法志當中的各種毛病，大致可以區分爲下列幾類：

第一，年代和時次的錯誤。例如太宗淳化中因蔡州的知州張榮和推官江嗣宗寬恤罪人而下詔褒獎，史志誤以爲眞宗時事；欽宗靖康初治誤國害民諸臣僚罪，最先賜死和被殺的是李彥王黼二人，其後爲梁師成，再後才是梁方平，而史志則誤以梁

方平爲最先就戮之人。

第二，地名和人名的錯誤。地名如金州誤爲房州，廣安軍誤爲廣定軍之類；人名如陳綱誤爲陳綸，朱巽誤爲朱選，胡思誤爲胡思文之類。

第三，記事自相矛盾。例如設置審刑院事，史志既以爲是太祖時候的事，又以爲是太宗時候的事。又如記訴理所事，本志與安惇傳有出入，記同文館獄事，本志與劉摯傳不盡同。

第四，敍事不能原始要終。例如史志的第一部份本是記述各朝編修和頒行格令諸項經由的，但對宋刑統的修撰卻一字不提，只於敍述新修編敕既成之後，附著「詔與新定刑統並頒天下」一句。又如不載哲宗元祐中施行階官犯贓罪者不帶左右字之制，而於高宗紹興中施行其制卻特加記載。

第五，類例區分不清。宋史刑法志三卷中，只有第一卷開首記格令的部份，第二卷末記詔獄的部份、和第三卷的後半記配役、贖刑、赦宥諸部份，算是分類比較清楚的，此外則全無標題，只是把一些相類甚或不相類的事件籠統敍述下去。我們現時參照輯本宋會要稿，趙汝愚編國朝諸臣奏議、文獻通考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諸書中刑法門的分類，雖也勉強可以把史志三卷區分爲若干門類，然每一類中總不免有出乎其類的事例，而在不同的兩門類中又不免有互相類似的事件。

第六，敍北宋事較詳，敍南宋事太略。宋史的通病之一，是詳於北宋而略於南宋。四庫總目的宋史提要說：『理度兩朝，宋人罕所記載，故史傳亦不具首尾。』並且舉出文苑和循吏兩傳爲例。錢大昕也說：『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寧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詳。』（見十駕齋養新錄卷七，南渡諸臣傳不備條。）刑法志中也正有這項毛病。其對於南宋一代刑政的敍述，屬於南渡初年的則失之於「叢冗無法」，屬於寧宗以後的則失之於「首尾不具」。

第七，刪改舊史文字而失其原意，甚至和原意完全相反。例如引錄陳次升論強盜計贓法的奏狀，而改其「竝增一倍」句爲「竝減一倍」；引錄利州路鈐轄論紐絹估贓的奏狀，而改其「多不至重法」句爲「多至重法」等。

第八，抄襲舊史文字而不稍檢照，遂乃以訛轉訛，甚至愈失愈甚。上文所舉史

志襲用通考諸條，均可爲例，這裏不再多舉。

在這八類之外，也還有一些毛病，例如刊寫方面的譌誤，將「紙」誤爲「縡」，「枷」誤爲「加」，「糧」誤爲「量」等。因其不是修撰人的過失，故不列入他們的罪狀。

宋史刑法志的全部記事既都是有所承襲的，則上舉八種疵病必也有一大部份是從舊的書册中沿襲了來，而不是由纂修史志的人製造出來的。事實雖或如此，而在負責纂修史志的人，卻不能以此作爲辭責諉過的藉口。因爲，修志時參考所及的各種書籍，或爲私修，或屬野史，或者爲著作人的學力和成見所拘牽，或者爲著作時的材料和時勢所限制，其記事自難期其不偏不曲，翔實周到；宋史是易代之後的政府設置專局纂修的，各種志書依理是應由各部門的專門學人分別負責的，修成之後又一定是要憑藉政治力量使其必傳於後世的，如此則史臣於秉筆之際必須具有一些責任感，於綴緝任何一條記載時，必先明悉本事之原委，比考諸書之異同，確證某說之是非，須待事狀灼然，方可下筆寫定。而宋史刑法志的撰人卻把這幾項必須經由的手續和步驟概置不顧，只顧鹵莽滅裂地襲用舊說，而又一方面用則不疑，一方面率意改削，遂致歧互紛錯，集諸般瑕纇之大觀，我們如何能不專向史志作者加以指摘呢？

儘管宋史刑法志中可訾議的問題這樣多，過去治宋史的學者們卻都不曾注意及此。柯維騏的宋史新編，把刑法志三卷刪併爲一卷，又標明門類，加以區分，又從列傳中鉤出數事移於志中，對於刑法志總算用過一番工夫，然而對於志中所有的各種差謬，卻全未加以補正，一切都照原樣移植在新編當中。清代武英殿刻本的二十四史，在紀志表傳之後大都附有考證文字，而獨於宋史刑法志三卷則不著一字。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中也僅舉述刑法志與列傳相重複之文字兩段。而譚瑄爲續北宋劉筠的刑法敍略而作的續刑法敍略，也和宋史新編一樣，只是節抄史志之文，毫無考索訂正之功。大約是因爲在他們的時代，得書不似今日之易，彙集資料的工作也不似今日之方便，所以不易引起校讐比勘的動機；再不然便是因爲過去的學人大都還是讀書萬卷不讀律的，所以要特意避開刑法志而不予注意了。

我對於宋史刑法志的考訂工作，本是和考訂宋史中另外的幾種志的工作同時進

行的。那時正是抗日戰爭的中期，我隨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昆明遷往四川南溪，研究所藏書之富，爲當時後方任何圖書館所不能及，所以我的考訂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後來因爲有些圖書是在後方無法得到的，遂只將職官志校稿一種整理付刊，另外的幾種全都沒有完成。前年復員來平，稍得多見一些後方所不可得見之書，便又取未完各稿重加訂補，而因爲刑法志的卷數最少，畢事最易，所以我的訂補工作便又先從刑法志開始。

我先後兩次所翻閱的有關宋代史事的官私書册，其成書大都是在宋史以前的。宋史刑法志中的記事，十之八九都可以在這些書册中找得出來。所以，不論它們和史志之間有無何等因緣，只因其成書均較早，其中的記載較與直接史料相近，故其可以信賴依據的程度均較史志爲高。我藉用這一些較早的記載，將宋史本志的全部記事加以比勘，較量其異同，論證其是非，訂正其謬謬，補苴其疏失。一切都和職官志考正的作法略相似。只有上述第六類的毛病我不曾加以救正，因爲那是重修史志者的工作，已不是我的工作範圍以內的事了。

我很盼望有專精法律的學人，依此考訂結果，更廣採兩宋官私史籍中有關刑政各故實，重訂義例，重行排比，爲宋史重新作出幾卷有條有理的刑法志來。這工作，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日廣銘自記於北平東廠胡同一號。

附帶在此聲明三事

一、我所用的宋史，是涵芬樓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宋史。其中的刑法志三卷，皆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是明代成化間的刊本。

二、我寫這篇考正文字的初稿時，是用文言寫的，今次重加補正，爲求一致起見，所以依舊用的文言。今後決將其餘各志校稿一律改用白話。

三、爲此考訂工作，先後所用主要參考書籍如下：

宋刑統（民國七年國務院法制局重校天一閣本）

宋大詔令集（北京大學藏舊抄本）

慶元條法事類（影抄鐵琴銅劍樓藏本）

輯本宋會要稿（徐松輯永樂大典本）

趙汝愚編國朝諸臣奏議（宋刻本）

呂祖謙編宋文鑑（四部叢刊本）

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明刊本）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馬端臨文獻通考（浙江書局本）

王應麟玉海（浙江書局本）

孫奭律音義（四部叢刊附刊於唐律疏義之後者）

李燾續通鑑長編（浙江書局本）

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廣雅書局本）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聚珍版叢書本）

王稱東都事略（覆眉山程舍人宅刊本）

李臺十朝綱要（東方學會排印本）

熊克中興小歷（廣雅叢書本）

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宛委別藏本）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元刻本）

宋史全文（元刻本）

兩朝綱目備要（四庫珍本叢書本）

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日本靜嘉堂文庫本）

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東方學會排印本）

司馬光涑水紀聞（商務印書館校印本）

曾布日錄（藕香零拾本）

陳次升讜論集（四庫珍本叢書本）

邵伯溫聞見錄，邵博聞見後錄（商務印書館校印本）

洪邁容齋隨筆（明馬調元刻本）

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四部叢刊本）

卷　一

一　律令制敕

（宋史刑法志三卷，原不區分門類，今參照宋會要稿、國朝諸臣奏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文獻通考及宋史新編諸書類例，爲分節標目。以下各節標目均係新增。）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

案：宋承五代之後，於五代敝政雖多所革除，其朝章政典之因襲於五代者亦殊不少，而刑法即其一端。輯本宋會要稿格令類一有云：

國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刪定格後勅，太和新編後勅，開成詳定刑法總要，格勅，後唐同光刑律統類，清泰編勅，天福編勅，周廣順續編勅，顯德刑統，皆參用焉。（刑法一之一）

王應麟玉海卷六十六詔令類律令下亦載會要此段，而刪去元和、太和、開成諸書，以後唐同光直承唐律令格式，其承認宋初參用五代律令之事實，意自可見。史志謂宋之法令專承唐代之律令格式，而略去五代各朝所續修之刑律編勅，非是。

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

案：會要刑法門卷一及李燾續通鑑長編，均以一司一務與一州一縣對舉，州縣指地方言，一司一務則猶今之所謂各部院會局署也。「路」當作「務」，或於「一司」下增「一務」二字以與「一路一州一縣」相對亦可。

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并頒天下。

案：竇儀奏請重修刑統，事在建隆四年二月五日，未久即編修竣事，遂於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己卯與所修編敕一同奏進（諸書或作八月二日奏進，茲從長編）。是年十一月甲子改元乾德，故諸書標著此事，或作「建隆末」，或作「乾德

初」，俱無不可，史志謂在「建隆初」則誤矣。

又案：史志上文於刑統修撰經過並無一字道及，忽於修撰編敕之下附著「詔與新定刑統並頒天下」一語，亦爲疏失。檢會要刑法門格令類一記其事云：

太祖建隆四年二月五日，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言：『周刑統科條繁浩，或有未明，請別加詳定。』乃命儀與權大理少卿蘇曉、正奚嶼、丞張希讓、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陳光乂、馮叔向等同撰集，凡創出令或宣勅一百九條，增入制十五條，又錄律內餘條準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之次，幷目錄成三十卷。別取舊創出格令宣勅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爲編勅四卷。其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不在焉。至八月二日上之，詔並模印頒行。

竇儀之進刑統表見呂祖謙編宋文鑑卷六十三（今世所傳宋刑統失載此表），覆按會要所述，除所載進書月日與長編稍不同外，其餘節次俱無不合。是則重定刑統乃宋初刑政措施中一大事，史志固應大筆特書者也。

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爲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

案：此段亦見通考刑考六，蓋卽史志之所從出。據會要刑法門卷一之二所載，咸平元年二月詔戶部尚書張齊賢等刪定淳化後盡至道末續降宣勅，十一月齊賢等上新勅，又詔柴成務等重詳定，十二月二十三日成務等上刪定編勅儀制赦書德音，詔鏤版頒行。長編不載張齊賢刪修事，疑爲輯本所漏落者，而於咸平元年十二月丙午亦載柴成務等奏上刪定編勅事。是則宣敕之增爲萬八千餘條，乃太宗末年事；其重加刪修詳定，乃咸平初年事。謂爲「咸平中」，非是。

天聖七年編敕成，……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

案：長編一一二明道二年（一〇三三）五月己丑載此詔，「自今」句下有「天聖所修敕令既已頒宣」句，餘俱同。唯查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九十二政事門四十五誡飭類三亦載此詔，題作誡約不得妄請刪改宣敕詔，所注年月日與長編同，文爲：

王言惟命，君擧必書。將信四方之傳，用垂後世之訓。儻數更於成憲，則滋

惑於衆聞。自今朝廷所降宣敕，不得妄請刪改。如事有未便，卽委中書密院奏聽裁。

其爲同一詔旨，自無可疑。然其間幾無一語與長編及史志所載相同，不知何故。

神宗……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爲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識此。』

案：洪邁容齋三筆卷十六勅令格式條有云：『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與史志云云略相同。此外各書，如長編、玉海、會要等，則勅令之定義適與史志互倒。會要刑法門格令類一元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記其事云：

左諫議大夫安燾等上諸司敕式，上諭燾等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謂令，治其已然之謂敕。修書者要當知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敕卽典則也。若其書全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刑法一之一二）

長編二九八元豐二年六月辛酉及玉海六六元豐諸司敕式編敕條所載與會要無一字異。又，長編三四四，元豐七年三月乙巳條附注引刑法志云：

至元豐修敕，詳定官請對，上問敕令格式體制如何，對曰：『以輕重分之』。上曰：『非也。禁於已然之謂敕，禁於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之謂格，設於此使彼效之之謂式。……』

據此數證，知容齋三筆與史志實誤將令敕二者之定義互倒。

又查通考刑考六亦引錄容齋三筆此段，疑史志卽自通考轉抄來者，非直接錄自洪邁之書也。

又有倍全分蠶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

案：長編（卷第月日同前）。附注所引刑法志及通考刑考六，「之級」均作「之給」，史志蓋涉下文「級」字而誤，當改。

靖康初，羣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

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

案：會要刑法一之三二及靖康要錄卷十一所載此疏節文均較詳。「付編修敕令」會要作「付敕令所」，要錄作「詔令編修敕令所」，史志須於「敕令」下補入「所」字方合。

然自〔秦〕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册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竝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

案：不標著周麟之進言之年月，卽以承上「秦檜專政」而言，則似當秦檜勢焰薰灼之日，麟之獨敢抗章論奏其僭妄者然；實則麟之之論列此事，已在權姦殂歿數年之後矣。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八五繫其事於紹興三十年七月乙未，史志當據以補入的實年月。

至乾道時，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以考據。

案：會要刑法一之四八載此項奏疏節文，繫乾道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旣行，乃爲具例。

案：此亦節錄當時臣僚奏疏中語。會要刑法一之四九載：

臣僚言：今之有司，旣問法之當否，又問例之有無。法旣當然，而例或無之，則事皆沮而不行。夫法之當否人所共知，而例之有無多出吏手，往往隱匿其例以沮壞良法。甚者俟賄賂旣行乃爲具例，爲患不一。

史志「泥而不行」當爲「沮而不行」之誤。

帝復以其書散漫，用法之際，官不暇徧閱，吏因得以容姦，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爲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頒之。

案：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五十七，孝宗淳熙六年二月癸卯載：

進呈淳熙海行新法。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勅令所分門類編，如律與刑統、勅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省吏不得舞文。』……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做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爲一書，若數事共條，卽隨門簒入。仍冠以淳熙條法事類

爲名。

會要格令類孝宗淳熙七年五月載：

二十八日，右丞相趙雄等上淳熙條法事類四百二十卷，目錄二卷。先是，淳熙六年二月十六日，都省言：『海行新法凡五千餘條，檢閱之際難以備見。』詔敕令所將見行敕令格式申明，體倣吏部七司條法總類，分門修纂，別爲一書。……至是，書成，上之。（刑法一之五二）

玉海六六淳熙條法事類條載：

〔淳熙〕六年正月庚午，趙雄奏：士大夫罕通法律，吏得舞文。……乃詔敕局取敕令格式……分門纂爲一書。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成書（四百二十卷），爲總門三十三，別門四百二十。以明年三月一日頒行，賜名條法事類。

是則淳熙條法事類之纂修，經始於淳熙六年正月或二月，蔵功於七年五月，八年三月方明令頒降。史志謂「四年七月頒之」，誤也。

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

案：此段語意不甚了了。會要刑法門格令類一載臣僚此項奏疏節文，今迻錄於後，稍資參照：

〔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臣僚言：『……州縣之間往往雜取向來申請續降指揮……與成法參用，……蓋向來續降指揮，其間或有便於人情，至今合用，而新舊申明闕遺不載，是以相循錯雜，悉至引用。……弄文舞法皆起乎此。乞明詔有司，……令各條具，斷自今日以前，淳熙新書以後，凡經引用續降指揮，隨敕申明不曾收載者，並行置册編錄，供申刑部，候齊足日繳申朝廷，委官詳與參訂，取其新書闕遺者附於隨勅申明之末，鏤版頒行；其已經改者，悉從删削，不許更有引用。……』從之。（刑法一之五五）

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鏜始上其書，爲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

案：直齋書錄解題卷七法令類著錄『慶元勅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目錄一百二十二卷，隨勅申明十二卷，總二百五十六卷。』合敕令格式四者計之，與目錄卷數適相等，故玉海六六慶元重修敕令格式條謂『敕令格

式及目錄各百二十二卷。』宋史藝文志三刑法類著錄慶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隨敕申明二百五十六卷，與書錄解題同。是則敕令格式必爲一百二十二卷，史志此條作百二十卷，非是。

又案：淳熙敕令格式成書之後，繼卽奉詔分門編類，別爲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史志上文已備敍其事。慶元敕令格式修成之後，亦曾依仿淳熙條法事類而另修一書，於嘉泰二年成書，宰相謝深甫等表上。是卽書錄解題所著錄之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亦卽宋史藝文志及玉海所著錄之慶元條法事類也。其書今尙有殘本傳世，稱慶元而不稱嘉泰，蓋爲奉詔修纂時所定名也。史志於慶元敕後不敍及其事，殊爲疏失。

〔淳祐〕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脩改者百四十條，粗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爲四百三十卷。

案：此次修成之書，史志不著其名，亦極疏失。宋史全文卷三十四淳祐十一年四月己酉載：

詔敕令所進呈淳祐條法事類，禮畢，鄭淸之，謝方叔，吳潛各進二秩。

玉海六六亦載淳祐十一年上「條法事類」事。史志當補入書名。

二　用刑

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凡徒刑五，……凡杖刑五，……凡笞刑五，……。

建隆三年，令諸州奏大辟案須刑部詳覆。尋如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於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

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吏一坐深或終身不進。……

唐建中令，竊盜贓滿三匹者死。……帝獨以其太重，嘗增爲錢三千，陌以八十爲限。旣而詔曰：『……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得判乃訊之。……

時天下甫定，刑典廢弛，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

案：以上計可分爲六目，就中有一目不止一事者，史志以類相從，通貫敍述，不盡依每一事實之時次爲先後之序，是誠當然；然此六目之序列，則應依每一目中最先一事以爲準則，而史志實未遵依此原則。今查：

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二月二十五日詔竊盜贓滿三貫者坐死，其錢以八十爲陌。次年二月改定爲滿五貫足陌者死。（見會要刑法三之一。後一事又見宋大詔令集卷二百、政事五十二、刑法類上，及長編卷三。）

建隆二年五月，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竝除名杖流海島。（見長編卷二及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

建隆三年（九六二）三月丁卯，令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詳覆。（見長編卷三。）乾德二年（九六四）正月甲辰詔諸道奏案並下大理寺檢斷，刑部詳覆，如舊制。（見長編卷五。）乾德三年（九六五）七月令諸州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同斷獄。（見長編卷六。）

建隆三年十二月六日，令諸道州府，凡有賊盜刑獄，如未見爲惡蹤緒，卽須設法多方辯聽，不得便行鞭拷。如證狀分明及贓驗見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須先申取本處長吏指揮。（見宋刑統卷二十九。）

建隆四年（卽乾德元年——九六三）三月癸酉定折杖之法。（見長編四及皇朝編年一。）

太宗淳化二年（九九一）八月己卯，置審刑院於禁中。（見長編三十二及會要職官一五之二九。）

史志列敍諸事，須照以上順序重爲排比方合。然在仇超等事件之下，史志仍繼述太祖開寶年內之刑政措施，而太宗淳化中置審刑院於禁中，本卷下文重出其事，此處應加剔除。

既而詔曰：『禁民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案：此卽前引六項事目中關於改定竊盜計贓法之詔令。史志之節文較通考刑考五所載更略，文字則無異同。會要刑法三之一亦載此詔節文，無「禁民」云云四句。宋大詔令集卷二百、政事五十三、刑法上載此詔全文，題爲「改竊盜贓

計錢詔」，題下跨注「建隆三年二月己亥」八字。其全文云：

王者禁人爲非，莫先於法令；議事以制，必務於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宜濟之以寬。盜竊之徒，本非巨蠹；奸生不足，罪抵嚴科。今條法重於律文，財賄輕於人命，俾寬禁網，庶合舊章。今後犯盜竊贓滿五貫文者處死，其錢以一百文足爲陌，不滿者降罪有差。

通考及史志之節文，「禁人」均改作「禁民」，「莫先」均改作「乃設」，「議事以制」均改作「臨下以簡」，「徒」均改作「生」，「今條法」均改作「近朝立制」，「律文」下又均竄入「非愛人之旨也」句，遂致詔旨面目全非。史志既與通考畢同，則此段必即抄自通考而又稍加刪削者也。

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卽時決遣，毋淹滯。

案：此段與通考刑考五所載從同。「輕繫」下通考有「小罪」二字，「毋」作「無得」，疑均史志所脫誤。長編卷十載此事於五月末，文字與通考全同。查宋大詔令集卷二百及會要刑法六之五一均載此詔全文，其後半段云：

宜令有司，限詔到，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長吏每五日一次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得淹滯。

詔中無「督獄掾」字樣，不知長編以次諸書何來此三字。又，詔末以「小罪」與「重繫」相對爲文，諸書均略去「重繫」二字，非是。

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

案：「他」當從長編二十三太平興國六年三月末及通考刑考五之記事作「須」。

然州縣禁繫，往往猶以根窮爲名，追擾輒至破家。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會兩浙運使亦言部內州繫囚滿獄，長吏輒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乃詔：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必加深譴，募告者賞之。

先是，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在或寅緣細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恆六七。張齊賢

又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慮問，若願負沈屈，致罷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屬俟旨，其干繫者免錮送。迺詔：諸犯徒流罪，並配所在牢城，勿復轉送闕下。

案：以上數事，亦嫌頗錯失序。今查：

一、張齊賢之奏請外縣罪人具禁放數白州，及其論列錮送諸州流罪人事，長編二十二均次之於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之末，僅於其下總結云：「詔悉從之」；不謂其與史志所載兩詔有關涉也。

二、兩浙轉運使高冕論諸州隱落罪囚數目，虛奏獄空，會要刑法四之八五載其奏章節文，繫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八月十五日。長編二十三所繫月日同，並於其下載禁諸州妄奏獄空之詔。是則此疏此詔應依其奏降時次另行排比，不應夾敍於張齊賢兩次奏章之間也。

三、會要刑法門配隸類載：〔太平興國〕七年閏十二月八日詔曰：『……應諸道州府犯徒流罪人等，並配隸所在牢城禁錮，不須傳送闕下。……』（刑法四之二。）長編二十三所繫月日同，其下載知桐廬縣刁衍奏疏，疏後附有李燾考語云：『去年秋詔百官言事，衍疏必因此而上，不知的在何時，附見丁酉詔後，恐此詔實因刁衍也。』此詔與刁衍奏章有無相關，姑不具論，其與張齊賢奏疏之全無干涉則斷然也。

史志合依此順序將以上數事重爲排定。又，張齊賢奏疏節文內「致罷官吏」句意殊不明，當從長編作「則量罰本州官吏」。

開封女子李訾擊登聞鼓，……〔帝〕卽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十四人分往江南兩浙四川荆湖嶺南，審決刑獄。

案：因開封女子訴請裁處家業而遣使按察諸路獄訟，事在太平興國九年六月八日，宋史太宗本紀、會要刑法五之一六、皇朝編年卷三、及通考刑考五均載其事，長編無之，想係輯本失收。會要及皇朝編年俱作「李範等八人」，疑史志之作「十四人」及通考之作「四十人」者均誤也。

太祝刁衍上疏言……帝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然不能從也。

案：長編繫刁衍疏於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其下附注謂：「去年秋詔百官言事，衍疏必因此而上，不知的在何時，附見丁酉詔後。」黃淮、楊士奇編歷代

名臣奏議二一六愼刑門載此疏，亦謂「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詔羣臣言事，知睦州桐廬縣刁衍上諫」云云。史志列此疏於雍熙二年，非是。又，長編於刁氏奏議後亦謂「上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焉。」而所附案語則謂興國七年十二月令諸州流徒罪人配所在牢城之詔，恐卽因刁氏此章而降；史志則謂「不能從」，未知孰是。

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

案：申覆，長編三十二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記事作「中覆」，玉海六六及皇朝編年並同，當從。

咸平元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責保於外。

案：長編四八繫此事於咸平四年二月末，「諸路」上有「令」字，「徒流」上有「持仗刼賊」四字，餘悉與史志同。通考刑考五亦繫四年而不著何月，餘悉與長編同。今查王禹偁以修太祖實錄獲罪，於咸平元年十二月末落職知黃州，則其論病囚院事必不在元年，當以長編通考所著年份爲是。

會要禁囚類繫王氏此疏於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其所錄原疏節文云：

病囚院每有患時疾者，互相浸染，或致死亡，請自今持仗刼賊徒流以上有疾，卽於病牢將治，其鬬訟戶婚，杖以下得情款者，許在外責保看醫，俟瘥日區分，從之。

詳其詞意，蓋在論述病囚院一遇時疾則轉相傳染，於病囚極爲不宜，故建請除情節較重犯人外，餘均準其保外就醫。是則病囚院之設置，旣絕不由於王氏之建請，亦且必在咸平四年之前。長編於王氏奏疏節文下附考語云：

此從本志，與實錄不同。據實錄則去年四月已置病囚院。

頗疑病囚院之設置以實錄所著年月爲正。蓋設置將及一年，其弊已自可見，故王禹偁從而論列之。若然，則長編、通考、史志所摘錄王疏諸語，均與原意相違，當依會要加以改正。

景德三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卽實大辟，頗乖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

以聞。

案：通考刑考五亦載此詔，文字全同。唯「三年」作「元年」。長編五十七亦繫此詔於元年八月辛酉。史志作「三年」誤。

帝出筆記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遴東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卽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周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又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必得人，須性度和平有執守者。」親選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

案：長編六六咸平四年七月癸巳載此事，「其一曰」作「指其一謂王旦曰」。是則起「勤卹民隱」迄「先命樞密院擇官」，並非筆記六事之一，史志改作「其一曰」，非是。「又曰」長編作「上曰」，則其下云云亦非筆記六事之一。「陳綸、李及」長編作「陳綱、李權、李及」，會要刑法六之七七及長編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辛酉均載「河北提點刑獄司陳綱上言」云云，則「綱」字不誤，史志作「陳綸」，非是。又「遴東」亦當從長編作「遴揀」。

知審刑院朱選上言。

案：通考刑考五亦載朱氏上言事，作朱巽。查長編六二、六三各卷屢見朱氏之名，其論官吏枉法受財疏見卷六六，亦俱作「巽」。史志作選，非是。

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

案：此與通考所載略同。查宋大詔令集卷二百二、政事五五、刑法下，載「不許楊守珍等乞凌遲合死強盜詔」，下注「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未」。末數語云：

> 今楊守珍等捉到賊盜內累曾爲惡者，送所屬州府照證指實奏裁，自餘並送所屬依法論決。

長編八五載此事，所繫年月日與詔令集同，亦謂「乃詔守珍等捕捉盜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情理切害者奏裁。」通考與史志僅謂「送所屬依法論決」，不載「累惡奏裁」事，稍疏。

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遇天慶節卽決之。

案：此天禧四年詔中語也。宋大詔令集二百二載此詔，題爲「令刼殺等死罪十二月權住區斷詔」，此兩句作「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過正月天慶節依舊行刑。」長編（九五）五月丙寅所載同。史志第二「遇」字蓋涉上文而誤，當改。（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降詔，以正月初三天書降日爲天慶節，休假五日。）

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獄疑上請，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秋季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天聖四年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

案：趙汝愚編國朝諸臣奏議卷九九，刑賞門恤刑類載燕肅此疏，題作「上仁宗乞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疏」，下注「天聖四年上，時判刑部。」長編一〇四上疏事繫天聖四年五月己卯，降詔繫壬午，僅二三日之隔，是則史志「天聖四年」字樣應移置燕肅上疏前，否則讀者將誤以其事在此年之前矣。「財五十八」、「雖一覆奏」，長編及通考刑考九俱同，獨諸臣奏議作「斷五十八」，「雖待覆奏」。「而州郡」云云四句，諸書俱作「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多增飾事狀」；「皆得覆奏」俱作「皆得一覆奏」；「漢律」上俱有「臣則以爲」四字；「諸獄疑」俱作「請獄疑」。史志均當據以補正。詔旨節文唯「輕重」二字通考及諸臣奏議作「重輕」，餘與諸書俱同。

又案：宋大詔令集二百二政事五十五刑法下亦載此詔，與諸書及史志所載詞句大不相同，未詳何故。

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

案：通考刑考九載此事，其文爲：

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釋。著爲例，名曰貼放。於是吏無所牽制，請讞者率多爲減死，賴以生者蓋莫勝數焉。

頗疑史志此段卽本諸通考，然脫漏極多，當依通考補正。

是歲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爲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爲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爲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隸二千里外牢城。

案：此段與長編一一七景祐二年八月朔及通考刑考六所載全同。唯「二千里外牢城」兩書俱無「二」字。查宋大詔令集二百二亦收此詔，題作「定強盜刑詔」，末云：

自今強寇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每千加一等，十千及傷人者，絞。持杖不得財，流三千里；流滿五千里者絞；傷人者斬，仍不分首從。不持杖滿千、及持杖罪不至死，並論如法，配千里外牢城。

知史志「二」字必爲衍文。詔令集此段與各書所載均有歧異，疑以詔令集爲正。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

案：史志此項節文過簡。通考刑考六載李綖此疏，首數句爲：

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妻殺夫，凡百四十；故謀鬬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一百十。

以下方接「風俗之薄」諸句，長編一九一嘉祐五年四月庚申所載略同。必如此，李疏文義方明。史志應據補數語。

凡在京諸班直請量斗斛不足。

案：「量」字當從長編二一四熙寧三年八月癸未及通考刑考六之記事作「糧」，謂所請月糧也。

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案：此神宗熙寧三年八月所立「丐倉法」中之一項也。「千錢流二千里」，當從長編（二一四）八月癸未之記事（長編紀事本末七十五增吏祿篇同），作「千錢流一千里」。

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

案：此亦「丐倉法」中之一項。史志丐倉法全文與通考刑考六所載畢同，唯本句中「過致」通考作「過制」。查長編（二一四）八月癸未之記事，本句作「其過致並與者減首罪二等」，其下又有「若許贓未受，其取與過致人各減本罪一等」之條。則「過致」不當作「過制」，通考偶誤。宋會要食貨門京諸倉類亦載此法，本句作「其引領過度幷行用錢者，於首罪下減二等。」其下亦有「若許贓未受，其取與引領過度人各減本罪一等」之條，是知「過致」意卽「過度」。宋刑統卷二八「部內容止逃亡」門「過致資給」句下注云：「謂指授道途，送過險處，助其運致，幷資給衣糧。」意亦相近。「行貨」二字疑亦當從會要作「行用者」爲是。（宋初所修刑統及南宋中葉所修慶元條法事類中，俱不見「行貨」字樣。）

呂嘉問嘗請行貨者宜止以「不應爲」坐之。

案：長編三四九元豐七年十月丁丑載呂氏奏疏節文有云：

乞定河倉法斷遣刑名，自陳告首之賞與引領過度一切如舊外，其行用者止以「不應得爲」坐之。

史志「行貨」二字亦以改作「行用」爲宜。

熙寧四年，立盜賊重法，凡刼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場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爲賞，妻子遞降等有差。

案：此段與通考刑考六所載全同，必卽抄自通考者。長編三四四載此事，係因元豐七年三月乙巳修元豐編敕成而附載者，不著立法之的實年份及月日。所載治盜及編管妻子諸條制與史志並同，唯於條文之上首著此法之演變云：

自嘉祐六年始命開封府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寧中諸郡或請行者，朝廷從之，因著爲令。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

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寖益廣矣。

於條文之後又附注云：

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時，因編敕成，附見。須細考之。

其所謂「至元豐更定」之法，必卽指「刼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等條而言，故雖云於刑法志中「不得其時」，而其爲元豐某年所重定，要無可疑。會要刑法門配隸類亦載一事云：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監察御史趙卨言：『元豐敕，重法地分刼盜者妻子編管，元祐新敕一切削去，前此編管者宜不少，請令從便。』從之。（刑法四之三〇）

此亦可證治盜重法中妻子編管之條文確爲元豐中所立定者。通考及史志之繫年均誤。

元豐敕：重法地分，刼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

案：長編四七八元祐七年十一月載：

乙酉詔：應重法地分，刼盜五人以上、或凶惡者、行重法，餘依常法。窩藏人準此。

合上段所引趙卨之言觀之，知自元祐以來，漸寬治盜之法，初則削去編管妻孥之條，繼又令重法地分刼盜須五人以上或凶惡者方以重法治罪，餘則全依常法。史志所載正爲元祐寬法之令，謂爲「元豐」者誤也。

紹聖後有犯卽坐，不計人數，復立妻孥編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請，詔改依舊敕。

案：此段爲直承「元豐敕」云云一段之文。元符三年之詔，史志不稍著其文，但云「改依舊敕」，亦使考史者莫明所謂。通考刑考六載此詔節文云：

〔元符〕三年詔強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其用兵杖湯火之類傷人及殘虐主家情狀酷毒，或汚辱良家，或入州縣鎭寨行刼，不在奏裁之限。若覊虜官吏巡防人等，罪不至死，仍奏裁。

史志當補入此項節文。

侍御史陳次升言：『……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絞者竝減一倍，贓滿不傷人

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爲之捕捕，恐怨讐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

案：陳次升此疏，見讜論集卷三及通考刑考六。讜論集題作「上徽宗奏論強盜法第一狀」。通考則附載於元符三年改強盜計贓法詔令（見前條）之後。史志不先載該項詔令，節次嫌不明備。「竝減一倍」，讜論集作「竝增一倍」。通考所載詔旨及陳疏節文竝同。今查會要刑法門定贓罪類亦有追述此詔之文：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書省檢會元符三年十一月七日指揮：強盜計贓應絞者，贓數竝增一倍。（刑法三之四。）

皇朝編年卷二十五，元符三年末「輕強盜刑名」目下所載全同，知史志「減」字必改作「增」方合。倍增其計贓之數，適所以輕減強盜罪刑也。「被害之家」，亦當從諸書作「被苦之家」。

又案：「恐怨讐報復，故賊益逞」及「恐養成大寇」諸語，均爲後來所刪改，非陳次升原疏語句，此外被削去之語句尙多。而凡經刪改諸處，史志俱與通考從同，則史志亦必襲用通考成文也。

乃詔如舊法，前詔勿行。

案：此所謂前詔仍指元符三年輕強盜計贓法之詔。然史志於元符三年則謂「詔改依舊敕」，於此又曰「詔如舊法」，語意殊含混不明。

元豐二年，成都府利路鈐轄言：『往時川陝絹匹爲錢二千六百，以此估贓，兩鐵錢得比銅錢之一，近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至重法。』

案：通考刑考六亦載此段，「利路」作「利州路」，「以此」下有「編敕」二字，餘與史志全同。查會要刑法門定贓罪類載：

元豐二年十二月四日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往時川峽絹匹爲二千六百，以此編敕估贓兩鐵錢得銅錢之一，近歲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盜賊寖多。（刑法三之三。）

長編三一所載與會要同。史志「利」下當補「州」字，「陝」當作「峽」，「多」下當補「不」字。脫一「不」字，文意全錯。史志既與通考同有此失，

則此條又必襲用通考之文也。

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斷獄奏狱，每二十緡以上爲大事，十緡以上爲中事，不滿十緡爲小事。

案：刑部大理寺所受獄訟，不以涉及產業財務者爲限，其區分獄事之大小亦斷不得一以緡錢之多少以爲準。今查長編四〇五元祐二年九月庚戌朔載：

刑部大理寺言：應限奏狱二百紙已上爲大事，十二日；十紙已上爲中事，九日；不滿十紙爲小事，四日。……又公案二百紙已上爲大事，限三十五日；十紙已上爲中事，限二十五日；不滿十紙爲小事，限十日。

會要不載此事，疑爲輯本失收。然職官門卷二四之二八載紹興二十一年刑部所定斷案日限，亦以滿二百張以上爲大案，二百張以下爲中案，不滿十張爲小案。是則獄案大小之區分，乃依其鋪敍事狀所用紙張之多寡以爲斷，史志敷「緡」字當倶爲「紙」字之誤。

中丞蘇轍……請竝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

案：蘇轍奏疏見欒城集四十六，「進」字下當據集補「呈」字。

六年，……刑部論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

案：長編四四五繫此事於元祐五年七月己亥，史志作六年，非是。應移此條於「五年」二字下，「詔命官犯罪」云云一事之前。

政和間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方許加訊。邇來有司廢法，不原輕重，加訊與常人無異。

案：會要刑法三之七〇及通考刑考六均載此詔節文，繫政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加訊」均作「枷訊」，當從。

中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爲命官立文；其後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則解役歸農，幸免重罪。』詔改政和敕「掌典解役從去官法」。

案：中書省於何時上言，改法詔於何時降下，史志均未標明，甚疏。會要刑法一之三〇載此事云：

〔政和六年〕八月九日，中書省言：『檢會律文，「在官犯罪，去官事發，犯公罪流以下勿論。」蓋爲命官立文。後來敕文相因修立，掌典解役（原注：謂出職歸農，已離本司，及勒停永不收敍。）亦用去官免罪。如此則犯罪之後，則（更？）生姦弊，解役歸農，僥免重罪。兼與命官犯罪去官不同。』詔政和敕內「掌典解役者聽從去官法」一節刪去不行。

史志當據此補入年月。又查慶元條法事類卷九，職制門六，省員併廢類載名例敕云：

諸公罪，因所犯替移，……若主典解役者，聽從去官法。

此卽政和六年明令「刪去不行」之敕條，不知何以南宋中葉猶復施行也。

卷二

一 恤刑

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月餘受賕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

案：通考不載此事。長編卷十二繫此事於開寶四年十月庚午，宋史太祖本紀同，此作三年，誤也。守英州者長編及本紀俱作「王元吉」，此作「董元吉」，亦誤也。又，長編紀事全文作『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受賕不法也。』李燾於其下附有考語云：

本志及祖宗故事云：『元吉知英州，月餘受賕七十萬，上以嶺表初定，懲姦吏掊克，特詔棄市。』按，受賕棄市者多矣，不但元吉也。又不緣嶺表初定乃有特詔。今不取。

史志記此事，與李氏所引「本志」及「祖宗故事」之文略相同，然必非直接本之二書之一也。

太平興國六年，……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婿，絕其吭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

案：通考刑考九載此事，作太平興國五年。查宋大詔令集卷二百、政事五十三、刑法上，載「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婦以殺傷凡人論詔」，卽爲安定婦人而降之詔，其下注太平興國二年五月丙寅，長編卷十八載此事，所繫年月日與詔令集同，是則通考及史志之繫年均誤。又，史志所節詔中數語，與通考全同，疑卽自通考轉載者。今查詔令集作：

今後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其婦，並以殺傷凡人論。

長編所載節文與此全同。知詔旨所指，專爲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其婦而言，通考及史志改作「姑殺婦者」，與詔旨本意頗相失。

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將死。……元吉之繫左軍巡，卒繫縛搒治，謂之鼠彈箏，極其慘毒。帝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內乃復寃酷如此，況四方乎！」

案：長編、皇朝編年、通考刑考俱不載此事。會要刑法五之二繫其事於雍熙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作「其子王元吉」，不謂「前室子」，未知孰是。又，宋大詔令集卷二百有「禁鼠彈箏詔」，下注「端拱元年正月乙酉」，其時上距王元吉獄事已隔三年有半，亦不知其何以遲遲至斯也。

眞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餱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

案：皇朝編年卷五，太宗淳化五年正月「寬饑民罪」事目下注云：

時饑民多相率持棒投劵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渚等三百一十八人皆抵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振饑民。遣使分詣諸道巡撫，上親臨遣，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爾，若其情非巨蠹，悉爲末減，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狠頭制，爲患閭里者，可便宜從事。」

宋史太宗紀淳化五年正月己巳亦記此事云：

遣使振宋、亳、陳、潁州饑民，別遣決諸路刑獄，應因饑劫藏粟，誅爲首者，餘減死。

史志此段所襲用之舊文，「眞宗」必原作「太宗」，修志者以上文已載及咸平間事，且有「眞宗察其詐」云云之句，遂改此處之「太宗」爲「眞宗」，而不知舊文亦用「類敍」之法，自此以下數事均盜劫倉廩之類也。（通考刑考五載此事，「五年」作「三年」，「三百」作「二百」，「張榮」作「張策」，均字誤。）

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

案：長編一七一皇祐三年八月載：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民無知，終緣於飢爾。』遂貸之。

此與史志所載爲同一事，必無可疑。然「天聖初」（一〇二三）者仁宗初卽位，章獻明肅太后同聽政之日也；及皇祐三年（一〇五一）則仁宗親政已近二十年矣。史志將其事錯出於二十九年之前，大誤。

〔天聖〕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卽降勅，饑民爲盜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衆。司馬光時知諫院，言曰：『臣聞勅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饑偸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案：此段與通考刑考六所載略同，必卽抄用通考之文而稍有刪改者。然據長編及宋史仁宗紀，因陝西旱災而降詔云云，爲天聖四年三月事。長編一〇三載其事云：

戊寅，詔陝西災傷州軍，持仗劫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配鄰州牢城，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仍令長吏密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卽降下有司敕，而民饑盜取穀食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衆。

宋史仁宗紀天聖四年三月戊寅亦載「詔陝西災傷州軍，盜廩穀傷主者刺配鄰州牢城，徒減一等。」是則史志及通考之繫年俱誤。

又查顧棟高編司馬溫公年譜，溫公生於眞宗天禧三年己未（一〇一九），仁宗天聖四年（一〇二六）八歲，五年九歲。寶元元年二十歲，舉進士甲第。嘉祐六年辛丑（一〇六一），年四十三，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至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年四十七，除龍圖閣直學士，改右諫議大夫，其間供職諫院達四年之久。其論列不當輕減京東西劫盜倉廩刑名疏，見溫公文集三十一，不載奏進月日，趙汝愚編國朝諸臣奏議一百六財賦門荒政類收此疏，改題「上英宗論災傷除盜疏」，下注「治平元年十月上，時知諫院。」年譜繫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十月十日，當均有所本。是則史志此段凡有三失：天聖五年溫公年方九歲，而謂其已知諫院，一誤也。奏章所論爲京東西饑盜取穀事，而編次於輕減陝西諸路盜劫倉廩刑名之後，二誤也。奏章上於治平元年，而謂在天聖五年，三誤也。須將此段全部移入下文英宗與盧士宗論和欽罪罰之後方合。

帝嘗御邇英閣，經筵講周禮大荒大禮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饑孚所迫，遂至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仁宗聽斷尤以忠厚爲主。隴安縣民誣平民五人爲劫盜，尉悉執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於州，州不爲理，悉論死。未幾，秦州捕得眞盜，隴州吏當坐法而會赦，帝怒，特貶知州孫濟爲雷州參軍，餘皆除名流嶺南。賜錢粟五家，復其役三年。因下詔戒勅州縣。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言仲約公罪應贖，帝謂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廢，復得敍官。』命特治之，會赦勿敍用。

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與。

案：以上四事，史志之編次亦極失序。今查：

因隴安縣民冤獄而貶黜孫濟等人，長編一一〇及宋史仁宗紀均繫其事於天聖九年（一〇三一）四月戊寅。其戒勅州縣之詔，見宋大詔令集卷二百二，題作「誡獄吏詔」，所注年月日亦同。

陳仲約、師仲說事，通考刑考六附載於嘉祐七年記事之下，其文字及順序與史志全同。然兩事相隔凡十七年，長編卷一二一寶元元年（一〇三八）正月

丁卯載：『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致仕。故事當有一子官，上以仲說嘗知金州失入死罪，特罷之。』

楊安國在經筵與仁宗面論災荒緩刑事，見長編卷一七七，繫至和二年（一〇五四）九月己巳。

治陳仲約誤入人死罪事，長編卷一七八及會要刑法四之七四均載之，同繫至和二年（一〇五五）二月癸巳。

史志應依此順序將以上四事重爲排比方合。若須參用「類敍」之法，則楊安國論凶年緩刑事當提移於上文天聖四年因陝西旱災而頒詔減刑一事之後，餘三事另作如上之排比。

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爲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爲上請，帝曰：『罪人已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宜以毆兄至死律論。』

案：容齋三筆卷十六載此事，通考刑考九引錄之，所稱宣州民姓名與史志同。唯查長編三〇三，元豐三年四月庚戌載其事，首句作「宣州民葉元有爲同居兄亂其妻」，下文載神宗批，亦作「罪人今皆已死，則二者同出於葉元有一口，不足用以定罪。」會要刑法五之一亦載其事，首句與長編同，所錄神宗批則作「葉元」，蓋偶脫「有」字。頗疑史志此條卽由通考轉錄容齋三筆之文而沿其誤者，宣州民之名姓實應爲葉元有也。

崇寧五年詔曰：『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自今應有特旨處分，……如或以常法格沮不行，以大不恭論。』

案：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七，大觀三年五月「制違御筆法」事目下載：

詔中外官司輒敢申明衝改御筆處分者，以大不恭論。

此與史志所載當卽一事，然則其事並不在崇寧五年也。

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三日以大不恭論。

案：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七亦載此事，謂在政和三年。

高宗性仁柔，其於用法每從寬厚。……知常州周杞擅殺人，帝……卽命削杞

籍。……

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遷左司諫，帝……謂宰臣朱勝非曰：「大中奉使，頗多與狱，今使爲諫官，恐四方觀望耳。」……

當建、紹間，天下盜起，……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也，……』

至待貪吏則極嚴。應受贓者不許堂除及親民。犯枉法自盜者，籍其名中書，罪至徒即不敍，至死者籍其貲。

諸文臣寄祿官竝帶左右字，贓罪人則去之。

是年，申嚴眞決贓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

案：以上諸事乃用以證明高宗用心之忠厚及懲貪之嚴厲者。其間無一事標著的實年月，其編次亦極錯雜，而最後突出「是年」字樣，究不知指何年而言。今查：

枉法自盜者籍名中書，事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正月乙未，見繫年要錄卷十二、會要刑法三之五、及中興兩朝聖政卷三。

李回奏強盜之數，事在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十二月丙戌，見要錄四十及中興聖政八。

贓罪人不帶左右字，事在紹興元年（一一三一）九月己亥，見要錄四七及中興聖政十。

申嚴眞決贓吏法，事在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十二月丁丑，見要錄五十及中興聖政十。

周杞因濫刑削籍，事在紹興二年（一一三二）正月庚辰，見要錄五一及中興聖政十。

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高宗謂其頗多與狱，事在紹興四年（一一三四）三月丁巳，見要錄七四及中興聖政十五。

據此，知「申嚴眞決贓吏法」與「贓罪人不帶左右字」確爲同一年事，然首須於贓罪人不帶左右字一事之上標著的實年月，其下「是年」字樣方有所承。

又，史志編次各事，如用類敍之法，亦當先敍懲貪諸事，依次而及於寬刑諸

事，庶前後節次不致相紊。

又案：宋史全文卷二十六孝宗淳熙元年三月末載：

初，祖宗因唐舊，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贓犯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爲當。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興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至是，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三，紹興元年末「文階繁衝復分左右」事目下亦云：

『有出身人帶左字，無出身人帶右字，贓罪人更不帶，如舊制。』

是則犯贓官吏不帶左右字，本元祐中所定之制，紹興初年乃舉舊典、行故事者。至孝宗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又因趙善俊之奏請，階官並去左右字（宋史職官志亦載此事）。計第二度施行此制，爲時凡四十四年。史志於上文不著元祐中之創行，則讀者易誤以紹興爲事始；於下文不著淳熙罷階官帶左右字之制，則更易令讀者誤以其後階官均爲曾犯贓罪之人矣。

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者當職官黜責，其最少者褒賞之。

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爲一匹，竊盜至二十貫者徒，至是又加優減，以二千爲一匹，盜至三貫者徒一年。

案：優減紐絹計贓之法，以二千爲一匹，事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六月七日，見會要刑法三之五及繫年要錄卷六；令郡邑月具禁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寡以爲賞罰，事在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子，見會要刑法六之六四及繫年要錄卷六十一。史志如爲行文之便，須將有關「以絹計贓」諸條連類敍及，則於「州縣月具繫囚存亡數」及「優減以絹計贓法」兩事之上，均須分別標明其降詔或施行之的實年月，庶時次明析，今以紹興二年之事編次於前，以建炎元年之事承接於後，而曰「至是」云云，文意殊駁。

又案：改以三千爲一匹，事在紹興三年（一一三三）九月八日己未，見會要刑法三之六、繫年要錄卷六十八及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五。史志於此條之前未曾一見建炎紹興之名，則此條「三年」上須標明紹興年號方合。

十三年詔：禁囚無供飯者，臨安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

案：會要刑法六之六六所載此詔節文較詳，繫紹興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爲是日大赦文中之一段。要錄一四六僅載是日大赦天下事，所載詔旨則較史志更略，但終可藉知會要之繫年不誤。史志作「十三年」，非是。

二十七年，詔四川以錢引科罪者，準銅錢。

案：史志此條適與原詔旨意相反。會要刑法三之八載：

二十七年三月七日，權尚書刑部侍郎張𣏌奏言：『法者天下之平，今泉貨之用，銅鐵相準，在法有制。然四川郡縣俗行錢引，以引定價，準之銅錢以定罪犯，遂致不侔：則有自笞入杖入徒，或應徒而流，或應流而死者。謂如強盜持杖，銅錢五貫，鐵錢十貫，俱坐絞刑；若盜錢引十道，便以十貫爲罪，市價止八貫，比之銅錢止是四貫，少一貫遂處以死。又如枉法二十疋絞，計銅錢六十貫，鐵錢一百二十貫；若受錢引一百二十道，便以一百二十貫計罪，市價止計九十六貫，比之銅錢止是四十八貫，少一十二貫，亦處以死。由是言之，四川之法偏重，極可憫恤。欲望行下四川州縣，凡以錢引定價科罪者，並依犯處市價爲數。』從之。

是知經張𣏌之奏請而明令改變者，正爲「以引定價，準之銅錢以定罪犯」之法，史志謂奏請之後方如此施行，大謬。

乃以內侍陳瑜、李宗回等付大理獄，究其賂狀，獄成，決配之。

案：中興聖政卷四十六及宋史全文卷二十四，於乾道三年八月均載此事，「陳瑜」均作「陳瑤」，未知孰是。

乾道二年下詔曰：『獄重事也，……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巧持多端，隨意輕重之，朕甚患焉。……』

案：宋史全文卷二十四，繫此詔於乾道二年三月壬子。其「治獄」云云數語作：

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興邪而不幸者罹酷，朕甚患焉。

三年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執政，探取旨意，以輕爲重，甚亡謂也。……吾將大寘於獄，罔攸赦。』

案：中興兩朝聖政四十六及宋史全文二十四，均繫此詔於乾道三年正月甲辰，所載詔旨節文均同。「疑者有讞」句下均有「持巧心設武端者有禁」句，此亦詔旨中重點之一，史志節去不載，非是。「以輕爲重」兩書俱作「以爲輕重」，「罔攸赦」俱作「罔有攸赦」，史志均當據以改正。

議者又言：『犯盜以勅計錢，定罪以律計絹，今律以絹定罪者遞增一千；勅內以錢定罪者亦合例增一千。』從之。

案：中興兩朝聖政四十八及宋史全文二五均於乾道六年閏五月載：

甲申，刑部狀：『據建康府司法參軍趙善寅申，準敕節文，今後權將勅律內應以絹定罪之法更遞增一貫，通四貫足斷罪。外有勅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遞增一貫。乞備申朝廷。』

又刑部狀：「據太平州申，亦爲上件事，並送部看詳。本部乞將應紐絹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貫，其以錢定罪者亦合一體更與遞增一貫。』詔從之。

史志所載諸語不甚清晰，須參此方明。

淳熙初，浙西提刑鄭興裔上「檢驗格目」，詔頒之諸路提刑司。凡檢覆必給三本：一申所屬，一申本司，一給被害之家。

案：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一「檢驗格目」條，記鄭興裔創製「檢驗格目」之事因極詳，謂其事在淳熙元年五月十七日。會要刑法門檢驗類亦載其事，所繫年月日同，且詳記鄭興裔所上「格目」全文。均可供參證。

嘉定四年詔：『以絹計贓定罪者，江北鐵錢依四川法，二當銅錢一。』

案：會要刑法門計贓罪類載此事云：

〔嘉定〕五年十月八日，知通州喬行簡言：『竊覩見行條法，計贓定罪，……今江北專用鐵錢，……而犯贓者以絹定罪，亦如銅錢，以四貫爲疋，贓輕罪重，犯者易入，深可惻惻。』事下大理寺申：『四川專法，以錢計贓定

罪者，鐵錢二文當銅錢一文，今兩淮用鐵錢與川郡事體一同，合行下應用鐵錢去處，並照應四川專法施行。』刑部以聞，從之。（刑法一之五九。）

是則行用鐵錢區域改依四川計贓之法，乃嘉定五年事；史志作「四年」者誤也。

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卽位卽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

案：宋史全文卷三十一，寶慶二年四月庚子載有恤刑詔節文。又，同書卷三十三淳祐四年正月壬寅載：

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理宗初卽位改元寶慶元年，爲西元一二二五；謹刑銘作於淳祐四年，爲西元一二四四，已在理宗卽位後之二十年，非卽位之初也。

二　詔獄

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逢謀反，提典刑獄王庭筠言其無迹，但謗讟，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編配。

案：長編二五九及通考刑考六均載此事，「謗讟」下均有「朝政」二字，當從。

若凌遲腰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

案：此段與通考刑考六李士寧獄事後所附載之案語略同，必卽自通考抄來而稍加改易者。

最後起同文館詔，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自謂畢禫當求外，入廟之計未可必。……俗稱駙馬都尉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爲粉父。……京惇言事涉不順，……望別差官審問。乃獄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會星變，上怒稍息，……曰：『……其釋勿治。』

案：史志此段，起「太府寺主簿蔡渭」，迄「其釋勿治」，與通考刑考六及皇朝編年卷二十四紹聖四年「治同文館獄」事目下所載全同。唯兩書「畢禫」均作「畢禪」，「入廟」均作「入朝」，此當俱爲史志轉寫致誤。王師約之父名克臣，不名堯臣，見長編四九〇紹聖四年八月丙申，及長編紀事本末一〇七，兩書則與史志同其譌誤。餘如「太府寺主簿」，長編、長編紀事本末及會要職官六七之二〇俱作「少府監主簿」，未知孰是；「與恕書請補外」則當從長編於「補」字上加「論」字，因文及甫卽願補外官，亦不能乞諸邢恕也；「粉昆指王巖叟」下當從長編及長編紀事本末補入「梁燾」，因文及甫置對時乃以「粉」與「昆」爲影射王梁二人也；「京、惇乞別差官審問」，當從長編於「審問」上加「同」字，非此後京惇卽不預其事也。凡此皆通考、史志與皇朝編年從同者。蓋史志此條抄自通考，通考抄自皇朝編年，而皇朝編年則出自長編紀事本末者也。

又案：宋史三四〇劉摯傳亦載此事，全文爲：

> 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以兄史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復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

此較本志所載，情節較爲詳盡。據長編紹聖四年八月丙申附注，知必本諸劉昉諸人所爲劉摯行實者。行實中以王師約尙主、父克臣遂稱「粉爹」，與韓嘉彥尙主、兄忠彥遂稱「粉昆」事竝舉，各書僅摘錄王師約事而遺韓嘉彥尙主事不

載，致文義不洽，須參此方明。

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雪除，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案：長編四九九元符元年六月壬寅及會要刑法三之二一俱載安惇此疏節文，「熙寧元豐」句中均無「熙寧」二字。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則作「熙豐之間」。「八百三十家」句，皇朝編年亦同，長編正文作「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下文引載曾布自敍則作「既而取索到理訴者凡八百九十七人」。宋史四七一安惇傳則謂「蹇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不知當時因此重陷罪戾者究爲若干家若干人也。至如通考作「八十三家」，則當係字有脫誤矣。

靖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言者論黼欺君罔上，……遣吏追至雍丘殺之。……

又詔賜拱衞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

暴少保梁師成朋比王黼之罪，責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之。

臺諫極論朱勔肆行姦惡，……三月，竄勔廣南，尋賜死。

趙良嗣者，……至是伏誅。

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即所至斬之。

案：以上數事，史志之編次亦舛錯失序。今據宋會要職官門黜降官六、長編紀事本末一四八「誅六賊」篇、與靖康要錄及宋史欽宗本紀所載，將上列諸人之竄黜誅戮月日備載如下：

靖康元年（一一二六）

正月　初二日　梁方平師潰。

初三日　王黼責授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言者論其欺君罔上等罪，猶在此日以前。）

李彥賜死。

朱勔放歸田里。

二十四日　殺王黼於雍丘。

二十九日　貶梁師成爲彰化軍節府副使，行及八角鎮，賜死。

二月　二十五日（一作二十三日）　誅梁方平。

三月　二十八日（一作十六日）　籍朱勔家，安置衡州。

四月　十六日　安置朱勔於韶州。

二十九日　朱勔移循州安置。

七月　二十七日　差監察御史張澂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

令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

九月　初九日　蔡攸移萬安軍，尋與弟儵及朱勔皆賜死。

十九日　張澂奏至南雄州將童貫已行刑了畢。

史志於李彥、王黼、梁師成諸人被誅戮之前，首著以「既戮梁方平」一語，殊爲不合。餘諸人事亦須依行遣先後重爲排定。

洪芻、余大均、陳沖、張卿材、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竝下御史臺獄。……思文於推擇張邦昌狀內添諂奉之詞，罰銅十斤。……上亦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懿文、思文竝以別駕安置邊郡。

案：會要刑法六之二五及職官七〇之五，俱載此事，「胡思文」並作「胡思」，繫年要錄卷八建炎元年八月朔日記事同。史志作「思文」，誤也。

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在五月一日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僞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斬都市。

案：宋齊愈於建炎元年七月十五日腰斬於都市，見繫年要錄卷七及中興聖政卷二，爲時適在洪芻、余大均等人責命之前凡半月，當移置其事之前。

紹興元年，監察御史婁寅亮陳宗社大計，秦檜惡之，十一月使言者論其父死匿不舉哀，下大理寺劾治。

案：婁寅亮以言宗社大計，於紹興元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宣教郎守監察御史，見繫年要錄四十九及中興聖政卷十，非除監察御史之後方上陳宗社大計也。其爲言官所論而下大理寺劾治，事在十二月十九日，見要錄五十及中興聖政卷十，

不在十一月也。

卷　三

一　讞疑獄

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兵。

案：通考刑考九載安崇緒訟母事，較史志此段爲詳。「廣定軍」作「廣安軍」。查宋史地理志五，廣安軍屬潼川府路，開寶二年以合州儂洄新明二鎮建，別無以廣定爲軍額者，史志誤也。

熙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三等論。…明年…復詔：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

案：通考刑考九載此事，但云「熙寧元年」，不著月日。「減三等」作「減二等」。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五試刑法篇作「七月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宋史神宗紀同。史志下文亦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句，知此條之「八月」及「三等」均誤。

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預也。

案：此與長編紀事本末七十五試刑法篇所載全同。通考刑考九作：「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爲二事以破析律文，盍從衆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病。」所述較爲詳明。

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流役，會赦應原。

案：通考刑考九及會要刑法四之七五均載此事，「加流役」均作「加役流」，當從。

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

案：史志所載中書劄子節文，起此段，迄下文之「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句，

與通考刑考六極少異同。然其間頗有刪略過當，致失原奏劄旨意之處。今參詳長編二一四熙寧三年八月戊寅及會要刑法一之七所載，史志「別立刑」，當作「別立刑等」，「除害」句下當補「自餘凶盜，殺之無赦」句。

其二，……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

案：長編及通考所載此句，均與史志同。「迭送他所」，意殊不明。疑以會要作「編管之人亦與免送他所」爲是。

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

案：長編卷二六三載此事，繫熙寧八年四月癸丑。通考刑考九作「五年」，非是。

中書堂後官劉衮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過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議。

案：長編二六三載此事，與史志大致從同。唯自「又請」云云，則作：

「緣法寺斷例，官司出入人罪，不用因罪人以致罪之法，乞自今官司失出許用此法。」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卽是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因罪人致罪之法；其失出人罪宜如衮議。」從之。

據知劉衮之所建請及審刑院、大理寺之所贊同者，均爲「官司失出許用此法」，史志改劉衮奏請爲「出入人罪皆有此令」，大誤。

邵武軍奏獻：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者自殺之。……

案：史志此事不載年月，長編三三五繫元豐六年六月壬申。通考刑考九作熙寧六年，非是。

〔元豐〕八年，……司馬光爲相，……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元豐八年別立條制。……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從之。

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

光之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

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卽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卽駁奏取旨勘之。』

元祐元年，純仁又言：……

案：以上數事，自「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至「光又上言」云云，既均繫諸「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之前，是必以爲均係元豐八年（一〇八五）事也。考之他書，殊不盡然。且元豐八年內事，史志之排比亦極爲紊雜。今查：

司馬光因曹州民趙倩等劫殺人事，於元豐八年七月乞請「自今後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更不得似前日用例破條」。原劄見溫公文集卷四十八，題作「乞不貸強盜白劄子」。其後遂有史志所載「諸州鞫訊強盜」云云之詔，長編三五八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甲寅。

司馬光因泰寧軍人姜齊等毆人至死，又乞請「今後應諸州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非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卽仰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見有可憫及疑慮，卽仰刑部於奏鈔後……擬如何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卽仰門下省駁奏，乞行取勘。」原劄亦見溫公集四八，題作「乞不貸故鬬殺劄子」。長編三五九繫元豐八年八月十二日癸酉。

元豐八年十一月初三日癸巳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減等。長編三六一及宋史哲宗紀所繫年月日全同。

范純仁奏請「除於法不首，不得原減外，其餘並取嘉祐編敕定斷，」事在元祐元年二月末，見長編三七〇。范氏疏中有論及元豐八年四月及十一月所立條例之語，明非元豐八年所奏進者。

史志所載「元祐元年，純仁又言」云云之奏劄，長編三七〇繫閏二月辛亥，與奏進前疏之日相去猶未久也。

史志敍述諸事之順序，合依此改正。

宜州民葉全二盜櫃偕寄錢，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有司以「屍不經驗」奏，侍御史辛炳言：『偕係故殺，衆證分明，以近降法不應奏。諸獄

不當奏而奏者雖不論罪，今宣州覩望，欲併罪之。』

案：繫年要錄七十二紹興四年正月戊午載此事，「葉全二」作「葉全三」，會要刑法四之八〇同。通考刑考九則又與史志同，未知孰是。又，當時預議其事者不僅辛炳一人，史志所載討論之詞亦非辛炳一人之言。據要錄所載：

侍御史辛炳等言：『偕係故殺，衆證分明，又已經委官審問，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裁。』

輔臣進呈，朱勝非言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而孫近以宣州有覩望，欲併罪之。

通考所載與要錄略同。史志將辛炳、朱勝非、孫近三人之意見併作辛炳一人之言，若非寫刊時所漏落，則史官之剪裁極爲失當也。

二　配役

徒罪非有官當贖銅者，在京師則隸將作監役，兼役之宮之，或輸作左校右校役。開寶五年，御史臺言：『若此者雖有其名，無復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則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斷遣。』於是並送作坊役之。

案：史志此段，意義極不明顯。御史臺奏論此事亦不在開寶五年（九七二）通考刑考七所載御史臺奏劄節文與史志頗有異同，而繫年則同於史志，未審何故。長編卷八繫此事於乾德五年（九六七）八月：

癸酉，御史臺上言：『伏見大理寺斷徒罪人，非官當贖銅之外，送將作監役者。其將作監舊兼充內作使，又有左校右校中校署，比來工役並在此司。今雖有其名，無復役使，或遇祠祭、供水火、則有本司供官。欲望令大理寺依格式斷遣徒罪人役，竝送付作坊應役。』從之。

會要刑法四之一乾德五年二月十四日之記事與此全同，知史志與通考之繫年必誤。大理寺奏劄要旨，亦須參此方明。

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

案：「東州市」通考刑考七作「東布州」，長編二十一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末作「東北洲」，各不相同，未知孰是。

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荷校執役。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鍼配役，至是，詔罷免之。始令雜犯至死貸命者勿流沙門島，止隸諸州牢城。

案：此條凡包括三事，而長編均未載及。通考刑考七載前二事，繫年與史志同。唯查會要刑法門配隸類載：

〔淳化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廣南東西路，先是犯罪配隸人皆荷校執役，自今除之。

四年七月六日，詔凡婦人有罪至流者，免配役。

眞宗咸平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詔雜犯至死貸命者，不須配沙門島，並永配諸軍牢城，兇惡情重者審刑院奏裁。（並見刑法四之三）

淳化三年爲西元九九二年，四年爲九九三年，咸平元年爲九九八年，上距端拱二年（九八九）或三四年，或八九年，史志均繫是年內，誤也。

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謂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貫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貫以上奏裁。

案：此段緊接「止隸諸州牢城」句下，既不云「舊制」爲何時之制，亦不載降詔果在何時，最易令人誤會爲亦係端拱二年內事。今查通考刑考五載此事，繫咸平六年，長編五四謂降詔在六年四月癸酉。須載明降詔之的實月日，「舊制」所指時日方明。又，「僮使」當爲「僮僕」之誤，然自長編已作「僮使」，不知何故。

凡命官犯重罪當配隸，則於外州編管，或隸牙校。其坐死特貸者，多杖黥配遠州牢城，經恩量移始免軍籍。

案：此爲宋初行用之法，見會要刑法四之一及長編卷八乾德五年二月癸酉。

皇祐中既赦，命知制誥曾公亮、李絢閱所配人罪狀以聞，於是多所寬縱。公亮請著爲故事，且請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轉運鈐轄司閱之。

案：「閱之」下當依會要刑法四之二三皇祐三年十月十三日記事，補入「詔依奏，其益、梓、利、夔路編配人內情理重作干礙條貫者奏裁」句。

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

案：史志此條不著年月，長編二二七繫熙寧四年十月丙午。通考刑考七作熙寧

六年者誤也。

熙寧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張仲宣嘗檄巡檢體究金州金阬，無甚利。……

案：通考刑考六載此事，「知房州」作「知金州」，宋史三四〇蘇頌傳同，當從。

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圖。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

案：據長編三六二，此爲元豐八年十二月癸酉所降勅命，史志不繫年月，則似自開國以來卽如此施行矣。

元祐六年，刑部言：『諸配隸沙門島強盜，……』

後又定令：沙門島以盜額移配瓊州萬安軍、昌化朱崖軍。

紹聖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詔今後應枉法自盜罪至死，贓數多者，並取旨。

案：史志以「後又定令」條置元祐六年後，紹聖三年前，而不著其的在何年，通考刑考七繫紹聖三年，是則亦當移次「紹聖三年」四字之下。惜輯本長編適缺此年，檢會要亦不獲，不知其與「枉法自盜罪」云云詔命孰爲先後耳。

或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道路有奔亡之慮，蘇頌元豐中嘗建議，請依古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三年不犯乃聽自如。

案：此爲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之一條，通考刑考七曾將全段引入。「依古圜土」燕語原作「依古置圜土」，通考脫「置」字而史志沿其失，知史志此條亦自通考轉抄，非直接採自燕語也。「而道路而奔亡之慮」句，亦當依燕語及通考作「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

崇寧中始從蔡京之請，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強盜貸死者，……許出圜土充軍無過者縱釋。

案：「出圜土充軍」當依會要刑法四之三二崇寧三年三月十四日記事，作「出圜土日充軍」。

南渡後配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曆中增至百七十餘條，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

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曆矣。

案：「南渡」句下疑必有大段脫文。自「祥符編敕」以下，則爲淳熙十四年臣僚奏議中語句，別見下條。

淳熙十一年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爲：『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籍？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

案：羅點乞減刺配法，中興兩朝聖政卷六十一繫淳熙十一年七月己丑，其後至壬寅日刑部大理寺卽集議奏聞，以孝宗別有意見，遂再諭刑寺官子細商量奏進，乃致稽置數年之久。史志謂「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實則中興兩朝聖政六十三於淳熙十四年八月末卽載臣僚言云云，是則並非更在十四年之後也。通考刑考七亦載臣僚奏章節文，較中興聖政爲詳，略爲：

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至於慶曆，已一百七十餘條。今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餘條。配法既多，犯者自衆。黥隸之人，所至充斥。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見定論。蓋緣刺配情理稍輕既欲降居役，則編管乃爲從坐，不應卻令徙鄉。輕重不倫，議乃中格。竊謂前後創立配條，不爲無說，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不足以懲惡。……（自此以下與史志所載節文略同。）

史志前條「祥符編敕」以下數語，均應移至「其後臣僚議」下方合。

三　斷獄

神宗卽位初，詔曰：『……應諸州軍巡司院所禁罪人……』

案：會要刑法六之五六亦載此詔節文，「司院」作「司理院」，當從。

五年，分命少卿左斷刑，右治獄。斷刑則詳事、檢法、丞議；正審。

案：「丞議」上當依會要職官二四之一五所載官制格目及通考刑考六，補「詳斷」二字，斷刑時須經檢法官詳斷官與評事及丞共議其事也。

〔元祐〕三年，罷大理寺獄。初，大理置獄，本以囚繫淹滯，俾獄事有所統，而大理卿崔臺符等不能奉承德意，……至是，臺符等皆得罪，獄迺罷。

案：此段與通考刑考六所載略同，唯「大理寺獄」通考作爲「大理寺右治獄」，當從。今查罷大理寺右治獄，爲元祐元年正月十日事，會要職官二四之一〇及長編三六四所載並同，通考及史志俱作「三年」誤也。

紹聖二年，戶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檢法官，應在京諸司事干錢穀當追究者，從杖已下卽定斷。

三年，復置大理寺右治獄，官屬視元豐員，仍增置司直一員。

大理卿路昌衡請分大理寺丞爲左右推，若有繇異，自左移右。……若探報涉虛用情託者，並收坐以聞。

初，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著爲令。

案：以上四事，史志之繫年俱誤，今查：

戶部於大理寺右治獄旣罷之後，依三司舊例，置推勘檢法官，治在京應干錢穀公事，乃元祐三年（一〇八八）五月二日事，會要職官二四之一〇、刑法三之六八及長編四百十所載並同。通考亦將其事繫接於「罷大理寺右治獄」一事之下。史志謂在紹聖二年（一〇九五），誤也。

著令定失出之罰，事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八月五日，會要刑法四之七八及長編四七六所載並同。史志次其事於「紹聖三年」（一〇九六）之後，而曰「至是」云云，是必以爲卽係該年事矣，誤也。

復置大理寺右治獄，事在紹聖二年（一〇九五）七月二十三日，會要職官二四之一二及宋史哲宗紀所載並同，史志謂在紹聖三年（一〇九六），誤也。

路昌衡奏請分大理寺丞爲左右推，爲紹聖二年八月十三日事，見會要職官二四之一二。史志作三年，誤也。

四　贖刑

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

案：會要刑法一之一及長編卷七均載高繼申奏章節文，繫乾德四年（九六六）三月十八日，通考刑考十（上）繫開寶四年（九七一），誤也。

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罪以上當贖法，私罪以決罰論。

案：長編卷二十四載此令，繫太平興國八年三月朔，史志承前「乾德四年」條爲文，不另繫年月，非是。

淳化四年，詔諸州民犯罪，或入全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之，自今不得以贖論。

案：通考刑考十（上）載此，繫端拱二年。檢會要及長編未獲，未知果在何年。「犯罪」通考作「犯薄罪」，「自今」下有「後並決杖遣之」六字，史志均當據以補正。

仁宗深憫夫民之無知也，欲立贖法以待薄刑，迺詔有司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其議科條非著於律者……別爲贖法。……』詔下，論者以爲富人得贖而貧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

案：仁宗令「別爲贖法」之詔，宋大詔令集二百二、政事五十五、刑法下載其全文，題作「律外條貫別定贖法」，下注「慶曆三年九月癸巳」。「其議科條」句，詔令集作「其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幷編勅所同議律外條貫。」長編一四三亦載此詔，所繫年月日與詔令集同，「非朝廷用法之意」句下有「卒不果行」四字，史志亦當據以補入，以明究竟。

五　赦宥

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恩者，上書願勿赦。

案：長編八九天禧元年三月辛酉載眞宗向臣僚追述此事，「秦再恩」作「秦再思」。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二十五、刑法門赦宥類「三年一赦」事目下所載同。通考刑考十二作「秦恩」，非是。

初，太祖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告諭，民無冒法。是後將祀必先申明此詔。

案：北宋開國後第一次郊祀爲建隆四年（九六三）十一月甲子，史志此詔則開寶四年（九七一）郊祀前所降者。長編卷十二開寶四年十月甲申載此事，「告諭民無冒法」作「告諭下民，無令冒法」，「將祀」作「將郊祀」，餘與史志全同。李燾於此條下附著考語云：

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慮強盜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館日曆幷言竊盜。竊盜情輕，不可與強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在酌中，而史官執稱不改日曆舊文。」眞宗曰：「當如何書？」旦曰：「止可言強盜」。上曰：「理雖若此，然不可輕改。當從史官議，庶幾傳信。」』今刑法志所書，實用眞宗聖語云。

據此所云，知長編本條記事蓋本之於太祖太宗兩朝正史刑法志，史志此條與長編不甚相異，蓋亦間接導源於兩朝史志者。（通考刑考十二繫此詔於建隆四年十一月郊祀之下，甚誤。）

天聖五年，馬亮言：『朝廷雖有是詔，而法官斷獄，乃言終是會赦，多所寬貸。惠姦失詔旨。』

案：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八赦宥門轉載史志此段，末句作「惠姦宄，失詔旨。」必是當時所據宋史爲元代初刻之本，猶未脫去「宄」字也。當據以補入。

因下詔曰：『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案：長編一九一嘉祐五年六月乙丑僅載「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過或不關政體者」，而不錄詔旨。東都事略仁宗紀及通考刑考十二均載詔旨節文，而均較史志此段爲略。查宋大詔令集一九四、政事四十七、誡飭類五載「誡約不得言人赦前事及小過細故詔」，所注年月日與長編同，全文云：

朕觀前代之稱治者，君臣同心，上下和睦，人知禮讓之節，俗無激訐之薄，何其德之盛也。朕雖弗敏，常竊慕焉。故夙興夜寐，罔敢荒逸。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臣僚多上封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告案無證之辭。或外託於公言，實內緣於私憤。事多曖昧，意肆誣欺。苟誣陷於良善，益傷薄於風化。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宜申警勗，俾務省循。敎而不悛，罰必無赦。自今中外臣僚，如有輒上封章告人罪狀，事非干己者，並當鞫劾，重寘於法。及言人赦前事，若有司受而爲理者，並論其罪。以至言事之官，雖許風聞，宜務大體。如事關朝政，而憚極論，以輔不逮；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咨爾多士，宜體朕懷。

史志「治古」、「協穆」、「信命」、「訊之」等，蓋俱爲刪削之失，或刊寫時有所脫誤者，須依原詔改正。

元祐元年，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墮曠，雖去官不赦，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官赦降原減條，請更刪改。』

案：會要刑法一之一四及通考刑考十二均載此事，「不以官赦降原減」均作「不以去官赦降原減」，當從。

六　郊赦

景祐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圜丘，未嘗輒赦。自唐興兵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能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卽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做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詔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嘗行。

案：此段與通考刑考十二所載全同。唯通考「興兵」作「兵興」，「以一赦免」作「一以赦免」，與史志稍異。今查趙汝愚編國朝諸臣奏議卷一百，載有

龐籍「上仁宗乞郊禮更不行赦疏」，下注「景祐元年二月上，時爲侍御史。」通考及史志此條所載「言者以爲」云云，卽龐疏之節文也。此所節錄諸語，原疏作：

> 三王之世，歲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綿代而降，郊祀不輟。至於賞赦，皆未之聞也。有唐兵興以來，事天之祀歲或廢之，迄於五代，三年之行，還必大賞，所以勞衞兵也；必大赦，所以蕩亂獄也。然則所賞既大，不可以歲舉，故必三載而躬祀也。……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無怨也，……一赦而使民悔善復惡，故以爲政教之大患也。……陛下誠能布發睿旨，昭示天下，今後郊禮之日，除賞賜之外更不行赦，使無敢爲虐，則善懦者懷惠，凶頑者知禁。

龐疏卽以「凶頑」句作結，「或謂」云云諸語，不知通考及史志據何書採入。史志所載龐疏之節文及所述後來不得施行之故，與通考全相雷同，其爲襲用通考之成文，必無可疑。其「興兵」「一赦」兩處，則必因傳寫而致誤者也。